

“双高计划”对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影响与挑战

李荣耀¹, 黄安琪²

¹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河南周口, 中国

² 淮阳区刘陈小学, 河南周口, 中国

【摘要】“双高计划”一方面通过以示范学校建设为引领、以专业群建设为依托, 加强职业教育类型确立,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要素集中度提升、指标体系统一等较为明显的类型化发展内部张力; 由于对发展速度的要求, 国家“双高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进一步促进东部高水平学校发展, 加大东西部发展失衡程度, 降低不同类型学校发展的积极性, 因此在双高建设中, 政策还要进一步调整评估体系, 重视行业企业参与、推动政策工具“促特”性转变。

【关键词】双高计划; 职业教育类型化; 产教融合; 政策优化; 评价体系

1. 引言

“双高计划”是我国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通过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重塑职业教育类型发展路径而制定的政策。“双高计划”的政策逻辑不仅在于统筹配置资源, 提高职业教育的发展质量, 还欲通过制度示范重构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发展中路径依赖于产业结构、社会属性定位不清晰, 发展被遮蔽于其他教育类型之中等原因造成的问题^[14]。“双高计划”在类型化发展思路下也推动了职业教育体系得以在整体发展过程中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也使得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失衡、标准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被凸显, 本文从理论分析入手来阐述“双高计划”在践行发展、影响推进的作用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为政策调整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1]。

2. “双高计划”对职业教育类型化定位的强化作用

2.1 政策目标与类型化发展的内在一致性

“双高计划”首先应建立在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要通过教育本身以完成从普通高等教育的附庸中独立出来实现“类型教育”转型这一逻辑前提上。它与职业教育本身类型建设的发展要求一脉相承, 一方面意在制度化提升职业教育的本体地位, 从而让职业教育不再只是普通高等教育的附属部分, 不再只是培养学术人才的教育类型, 而应是具有独立的教育体系和社会功能的培养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2]; 另一方面,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政策要求, 将职业教育以就业导向及技能培养为特征的教育类型属

性再次制度化体现出来^[13], 从而以制度化的手段避免了职业教育类型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同质化竞争, 以集中资源、支持部分院校创新发展为模式引领全盘, 实现对职业教育教育体系的类型化建构^[3]。

2.2 专业群建设对职业教育的分类引导

专业群建设是“双高计划”的另一“抓手”, 它结合了同一产业链上下游的不同技能需求, 以模块化、集群化的方式形成专业群, 从而真正实现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分类^[6]。传统职业教育专业的发展往往被切分为各个“小块”, 而且具有重复的现象, 而专业群则强调将不同领域的专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将岗位需求合成到专业岗位的教学能力上, 使学生在掌握技能核心的同时, 又具备在产业不断更新上具有一定的迁移和适应的能力, 这种分类的引导不仅是对职业教育内部结构优化, 还是对职业教育与产业对接的匹配度优化, 使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更加明显^[5]。同时, 在“双高计划”建设中, 促进职业院校在课程、师资以及实训基地建设中进行分工协作, 巩固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15]。

2.3 示范性院校对类型认同的塑造功能

遴选“双高计划”的示范校起到典型示范导向的职业学校, 在职业教育类型化建设方面往往代表着职业教育质量的最高水平, 是高质量落实“以类型特性凸显职业教育中国特色, 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建设任务的“排头兵”, 它的办学成果、毕业生质量、社会认可度也将直接间接地影响人们对于职业教育本身的认识^[11]。示范校通过构建高水平专

业群、校企合作、国际化推进等提高质量成效,树立职业教育质量和价值自信的示范作用,形成向周围其他职业院校“排头兵”和“先锋示范”作用,促使其他普通职业院校注意和重新考量办学定位,避免将职业教育提升到向普通院校转变的道路上的盲从;其次是示范性职业学校在政策支持下产生的品牌效应能够提高职业教育的受认同度和影响力,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培养人们对职业教育类型认同意识,这样的示范性院校作用必将是典型的,会促进职业教育在中长期建立自己的独立、稳定、可持续的建设生态^[18]。

3. “双高计划”实施中的结构性矛盾与挑战

3.1 资源集中化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张力

“双高计划”集中于优先重点支持部分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办学,短期内能够提升部分示范性高职学校办学水平^[16],然而它带来的资源倾斜也形成了职业教育内部的“马太效应”,政策投入、优质师资、企业合作机会等向特定学校集中,使得经济发达地区与重点院校能获得更多政策红利与发展优势,而中西部区域和一般职业院校则有可能成为被帮扶、受冷落对象,区域发展整体水平仍呈倒梯形分布,更快速见效的同时往往导致职业教育整体生态的单调、丰富性减弱,可能会降低各区域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10]。从类型化角度看,高职教育需要注重因地制宜、就地发展地方产业,过度集中资源可能造成非示范校被带动盲目选择示范校发展路线,反而失去了自身的优势。如何在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中找到一个点、避免少数重点突破情况下忽视了面的协调,成为“双高计划”下一步落实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17]。

3.2 标准化评价体系与多元发展需求的冲突

“双高计划”实施中提出了以“量”作为政策工具的考评指标,如专业群的建设指标、专任教师的数量指标、就业率指标等,标准化工具能够方便政策实施和绩效反馈,但可能会背离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所必需的多样性与弹性^[12]。因为职业教育属于面向区域产业岗位培养多样职业人才的过程,不同学校的专业特色、办学定位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巨大差异,如果完全用同一套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则很容易导致学校趋同发展^[20],走程序性策略以适应政策目标的要求,缺乏探索性和创新性,譬如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

师资水平会偏离职业教育的“双师型”教师实践技能要求,只注重统计就业率会挤出职业长线发展能力的投入等,是政策工具与类型化目标相脱节,未来应从包容性和动态角度对学校的特质性办学逻辑予以关注,在适度底线门槛中得以彰显。

3.3 短期绩效导向对类型化长效机制的削弱

“双高计划”本身是一项阶段性计划,阶段性目标与结果验收的压力,使得较多院校存在政策期的功利化职业发展心态,从而在短周期见效快、可评估成果强的领域进行资源输入(如建设内容上的设备购置、证书达成率)偏多,而对于“类型化发展”所需的积累周期较长的工作(如改革教学内容结构、产教融合,优化产教融合途径、加强师资梯队培育等)的资源投入偏少^[4]。以绩效竞赛为主的职业教育发展,容易使院校发展过程趋于表面化、不稳定化,而以绩效为核心的短期引导,也容易消解类型化院校的自主发展能力,使其过度期待并依赖于外在资源的输入,一旦外在输入式扶持减少或终止,部分职业院校可能因自身短板积累无法满足政策式发展要求而出现类型化失衡的问题^[9]。如何处理政策实施与学校发展的矛盾关系,应进一步考量政策设计的长效化趋势和激励措施,例如在院校运行发展上,增加动态修订环节,督促其立足于所在区域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来规划自身的改革之路,防止职业院校类型发展沦为“竞争获得资助资源的短期游戏”。

4. 政策优化视角下的类型化发展路径重构

4.1 动态调整机制与分类评价体系的完善

“双高计划”的现实指向之一是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对标准单一、同质化发展的问题,应当建立起机制弹性大、发展动态性强和科学分类的评价体系。对机制动态性要求其实包含三个层面:(1)动态调整机制建设——需要构建“产业风向标”监控产业关联度变化,形成专业设置及办学思路等适时调整机制;建立“院校风标”,就入选“双高计划”院校情况,建立完善制度性规划,定期对学生培养模式、资源投入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进行监管,形成“能进能出”的动态调整机制;(2)动态分类评价体系——需要根据学校服务面向定位(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振兴等领域),探索学校评价机制改革,要构建学校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区别化评价机

制；(3)需要从“一刀切”的政策制定向“小切口”的学校转型发展体制转变，真正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化定位发展方向的制度内化于心并切实践行于行。

4.2 产教融合深化对职业类型的本质回归

以产教融合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的深度是一种类型属性^[19]，但目前“双高计划”学校的产教融合仍显虚化，“浅度”融合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参与形态低级化、产教融合形式单一，深度上要有所突破，包括治理层面，行业企业进入院校权力结构内部，参与专业标准制订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7]；培养层面，建立弹性学制“工学交替”，深度融合教学过程与生产周期；资源共享层面，建立校企共建的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平台，“真实”生产项目成为教学项目。这样融合才能摆脱学科体系之路，使职教从本质上转变成职业能力图谱、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新产教共同体应注重中小微企业，避免把融合资源过度地配置到龙头企业上，保持职教的广泛职业类型覆盖。职教真正成为产业链中的要素，类型属性才真正成为现实^[8]。

4.3 政策工具从“扶优”向“促特”的转型

“双高计划”启动阶段的“扶优扶强”尽管效果立竿见影，但也很容易催生院校发展趋同等同化问题，未来政策工具的选择应当转向“促特育新”的精准支持方式。“促特育新”在支持重点、支持方法、政策目标三个层面上均有策略转向：一是在支持主体上，从支持部分院校转向支持部分专业群，特别是围绕新兴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而具备潜能的重点项目；二是在支持举措上，从资金直接投入转变为提供技规技标开发、教师培养培训的服务能力；三是在政策意图上，从重视短期显性的成果转换为促进学院可持续能力的培育。另外应当建立健全以“特色发展指数”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即要考量院校服务区域产业、传承传统技艺、创造就业岗位的独有性价值功能。同时应配套制定职业院校结成联盟的机制，使得东西部院校能够将优势的的特色专业形成要素流动，可学习、可借鉴的互动关系等。以期通过政策工具的转型来解决因资源集聚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及类型创生活力被消解问题，最终获得百花齐放的中国职业教育生态发展局面。以期将每一所职业院校发展成符合自身条件发展的定位坐标，从而为构建起中国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生态图景。

5. 结论

“双高计划”从顶层规划上确认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但在落地实践中的影响仍有待观察。新时代类型化既需要破解资源禀赋发展不平衡的马太效应，又需要克服传统教育评价范式路径锁定效应，今后在政策制定上更为需要差异化的逻辑思考，寻求政策与制度创新中效率与公平的协调，最终促成职业教育由“层次”上升到“类型”的重大跨越，这不仅是“双高计划”本身政策问题的目标达成，也是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 [1]曹登华.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特点的实训教学改革[J].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23,32(06):71-75.
- [2]徐晔.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及实践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41(15):30-33.
- [3]鲍桂楠.协同创新视域下高职院产教融合模式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5):61-62.
- [4]陈元高.以就业为导向,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大力实施现代职业教育[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2(01):74-76.
- [5]赵文亮.高等职业教育类型与层次的思考[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5(04):6-9.
- [6]黄志.现代制造业“双高”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J].职业,2008,(24):62-63.
- [7]黄志.“双高”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
- [8]杨八妹.电工专业双高型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讨[J].职业教育研究,2005,(08):12-13.
- [9]俞美华,傅炜昶.浅析职业教育教材质量评价体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28):55-56.
- [10]姜南扬.探寻优化政策模型[J].理论探讨,1988,(04):63-67.DOI:10.16354/j.cnki.23-1013/d.1988.04.013.
- [11]许秀林.新职教法实施背景下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策略[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22,36(02):22-26.
- [12]唐佩.新时代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0(01):50-55.
- [13]郭文富,马树超.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J].上海教育,2022,(01):58.
- [14]张文汇,何欢欢.双高计划引领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区域性协同发展探索[J].山西青年,2020,(03):54.
- [15]康翠萍,龚洪.“双高计划”建设中政策工具选择及其优合策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1):16-24.
- [16]秦雯,曾文权.“双高计划”下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发展策略探究——以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为例[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11):249+251.
- [17]魏艳娥.“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行政教辅人才队伍建设[J].教育观察,2019,8(36):65-66.DOI:10.16070/j.cnki.cn45-1388/g4s.2019.36.028.
- [18]王磊.如何正确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类型[J].成才之路,2009,(06):6-7.
- [19]杨近,姚启和.高等职业教育概念的界定——兼谈高等教育类型的区分[J].教育与职业,2000,(08):16-18.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00.08.021.
- [20]郭恒泰.学校教育评价方法体系初探[J].教学与管理,1988,(02):16-20.